

中共党史专题报告汇编

(一)

北京市高校党史协作组
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

目 录

新长征的纲领性文件·····	廖盖隆	(1)
周恩来同志从旅欧到大革命时期的		
理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 胡 华	(64)
关于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		
几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 王 淇	(83)
百团大战的经过及其重大		
历史意义·····	军事学院 蒋 杰	(125)
陈独秀的简历·····	中国人民大学 林茂生	(148)
关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		
情况·····	北京大学 张注洪	(173)

新长征的纲领性文件

廖盖隆同志1979年11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
作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的辅导报告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叫做：新长征的纲领性文件。我想在这个题目下面讲一讲，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不过我讲的不是叶剑英同志这个讲话的所有的重要的内容，比方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准备多讲了，也准备尽可能地回答有些同志在学习这个讲话时提出的一些问题。

叶剑英同志这个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国务院讲的，是经过党的四中全会郑重地讨论，一致通过的。所以，它是党和国家一个正式的、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的重要文件。

不久以前，去年12月的三中全会和今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了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吹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的进军号角。现在，四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在总结建国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地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的正确道路。叶剑英同志的这个讲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正象四中全会的公报所讲的，这个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这是一；第二呢？它是全面地回顾了建国30年来战斗的历程；第三，深刻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第四，这个讲话，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最后，这个讲话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所以总起来，四中全会公报说，这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四中全会的公报，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认真地学习和贯彻叶剑英同志的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在全会讨论以前，曾经在8月中旬和9月中旬，两次在党内广泛地征求了意见。就是说，在北京、在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都开了讨论会，征求对这个讲话稿的意见。9月中旬，并且在北京，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至少有一千多人参加了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补充修改的意见，最后又经过了四中全会郑重的讨论通过。所以这个讲话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

叶剑英同志作这个讲话的时候，除了有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新长征的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和各民族的代表参加，有归国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参加以外，还破例地邀请了各国的驻华使团，外国来宾和外国新闻记者参加。因此，这个讲话，立即在全国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个讲话，不但得到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除了苏联等极少数的国家不说，来自世界各国的评论都是很好的。国外的评论认为，这个讲话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日本的共同社就说：国庆讲话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的《新闻周刊》认为这个讲话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关于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间，对于我们党所犯的错误的自我批评，国外的反映是很好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正式作了自我批评，这就说明，中国已经成熟了。南通社说：这是作为党，而不是个别的党员，对过去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法新社的评论就指出：这个讲话以明确的措词赞扬了毛泽东，然后对他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口气是尊重他的，但是毫不含糊。就是说该讲的话，还是讲了。美联社说：这个讲话指出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许多国外的评论都认为，叶剑英同志发表了这个国庆讲话，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充满了信心的，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当前是处在从未有过的安定的状态，政治上是很稳定的，有些评论还说，只要我们现代化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那么中国的政治就是不可逆转的。美国的通讯社美联社的评论还指出：这个讲话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新纲领的基本原则。这个纲领是到现在为止，对新中国的方向最有胆量的、最广泛的阐述。共同社的评论还指出了，讲话做为现代化建设的总动员令，具有莫大的魄力。我认为这些评论都是比较客观和说得相当中肯的。确实，这个讲话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的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件。

我的讲话准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建国30年来的伟大成就和曲折道路。

二、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历史作用

的评价问题。

三、关于如何防止林彪、“四人帮”事件重演的问题。

四、关于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治政路线和任务的问题。

五、关于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的题目叫做：沿着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勇敢地向前迈进。

我讲的有不妥当的或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同学们指出来。

第一部分 建国30年来的伟大成就和曲折道路

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的第一部分（光荣伟大的30年）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讲30年来的伟大成就；另外一个，是30年来我们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现在，我们先看30年来的伟大成就。我们建国30年来有没有什么成就可讲，这些成就算不算是伟大的成就？我们认为，我们的党中央认为，是有成就的，是有伟大的成就的。这个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国庆讲话例举了五个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政治上的成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和巩固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局面。当然所谓大统一、大团结的局面也还不是很完满的（台湾还未统一）。我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建立了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政权。并且，这个政权已经表现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我们的人民政权在制度上和组织上，还是不完善的，还要使它更加完善。这是第一个成就，这是我们取得其他一切成就的基本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我们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个体私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都已经消灭了。改造了个体劳动者，个体私有的劳动者，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个体私有劳动者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改造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了。总起来看，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里讲的主要的标志是两个：一个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全国的范围内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个公有制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全民所有制，一个是集体所有制。另外一个标志呢，就是初步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说是初步实现了呢？因为它还是不完美的，还带有一些平均主义，以至于一些同它相反的不太符合按劳分配的成分。我们的经济制度还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能够、而且也一定要使它完善起来。我们一定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第二个成就。

第三个成就讲的是经济建设的成就。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原来的基础是很薄弱的，叫做“一穷二白”。我们的生产力，我们的经济是很落后的，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也就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四个成就，是文化建设的成就。我们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以及身体的素质、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拿文化程度来说，国庆讲话里没有用这个数字，没有讲这个

情况，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解放以前，我们全国有80%以上的人是文盲。现在呢？大多数人识了字，在城市里头是绝大多数的人识了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当然，我们比较日本、美国、西欧那还差，他们是人人识字，文化程度很高。我们呢，还只是大多数人识字，还是落后的。但是呢，我们比较解放以前，那是大进了一步。这些就为四个现代化准备了必要的科学文化技术条件。

第五，外交上的成就。外交上的成就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一点就是，我们巩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使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现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中间的稳定性的因素。其次呢，我们打开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新局面，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组成了或正在组成一个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这样广泛，可以说是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就是中、日、美、欧一条线，中国、美国、日本、西欧一条线，组成一条线；第二第三世界一大片，第二第三世界的国家一大片。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斗争的新局面。这个整个的力量的主动方面是在我们方面的，我们争得了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条件。这个国际条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争得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有可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得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取得了这样的条件，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大规模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的经验来进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这个条件从来没有过，解放初期是美

国来封锁我们、孤立我们；后来呢，加上了一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来孤立我们、封锁我们。可是，以后的情况，走到反面了。不论是日本，是美国，是西欧，都争先恐后地要跟我们发展关系，要跟我们做生意，要跟我们进行经济上的合作，科学技术上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生前在外交方面所作的战略和决策，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内，打开了同美国、同日本、同西欧的关系，实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条件。

所有这些成就，就是建国三十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的确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无可争辩的、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得见、也摸得着的。这一切提供了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可靠的条件、可靠的前进阵地。我们能够从这个阵地出发，去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讲一方面的问题：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三十年来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是曲折的。叶剑英同志在他的讲话里讲了：“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这句话是讲得很实在的。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成就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是说，对于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不应该不害怕。对我们所遭到的失败，我们所犯过的错误的经验教训，应该作出一个总结。对这条我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经验教训应该作出一个基本的总结。但是有的同志，有少数的人、个别的人，是不同意作这种总结的。他们说，既然是庆祝大会嘛，只要作一个庆祝性的、鼓动性的讲话

就行了。好比说，恭喜发财呀，光讲我们成就的一面，都是说好话，说好听的。据说，这样才能鼓劲。如果讲一些问题呢？据说是不可行的。因为讲一些问题，那么据说现在我们已意见分歧了，因为三中全会以来，就有少数的人不同意党的路线，对党的路线表示怀疑。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华主席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又讲了一些问题，现在大家还是消化不了。比方阶级斗争的问题，大家就是意见分歧，觉得好象我们在宣传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既然已经有分歧了，怎么还能讲问题呢？如果再讲问题，那就要引起更大的分歧。有这种意见，但是，这是少数人的意见，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既然你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要改进我们的工作，就必须对过去三十年走过的道路作出基本的总结，才能吸取经验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胡乔木同志9月25日在四中全会解释国庆讲话起草的经过的时候，曾经指出，他说如果我们作一篇讲话，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但是呢，又不去总结，不去对我们三十年的问题，特别是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作出一个评价，那就是给全国人民、全世界的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的党中央很软弱，我们党中央意见分歧。因此，对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不能说什么话，不能赞一词，那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我们自己将很虚弱，对过去犯过什么错误都不敢来作自我批评，这显然是不好的。而且，在全国人民、在全党，原来的意见分歧不会因为我们说好话就解决，就前进一步。相反的，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基本的估计，根据大家的觉悟程度，根据全国人民、全党、全国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的程度来做出总结，那就可以统一我们的思想，使得我们全党全国大多数人有一个标准，也可以说服少数对我们党的路线不

满意、不同意的人，说服他们，使他们同党团结起来，向我们的党靠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做。

所以，对于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是不可避免的，是不能回避的，一定要这样做的。国庆讲话里讲：“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这里讲两个事儿。一个是讲要在适当的时候，中共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对于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出正式的总结。就是说对于建国三十年以来的历史作出决议，作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这也不需要很长时间了，比方说，大概在1980年，恐怕就要作出这样的总结来。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可能有些同志对于叶剑英同志讲话里所作的估价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同志们可以把意见保留起来，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来还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是初步的、基本的估价。

这个初步的、基本的估价当然是党中央经过慎重的考虑作出来的，也不是马马虎虎随便说的。但是这到底是初步的还不是正式的，正式的将来还要作出决议。所以如果有意见还是可以保留。但是呢，需要做出这样一个初步的、基本的估价。这个初步的、基本的估价，总起来就是一句话：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判断，这是重大的判断，可以说是非同小可了。什么叫做大部分时间？三十年嘛，如果说十年时间路线是正确的，那就是小部分时间路线是正确的；如果十五年的时间路线是正确的，那就是一半的时间；是不是啊？只有比

十五年多，十六、十七、十八年、二十年路线是正确的，才能够说大部分的时间路线是正确的嘛，是不是？那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个别少数的人认为，我们党的路线一贯正确，三十年一贯制。这叫做一贯制，就是说我们的路线从来就是正确的，这个路线是毛主席的路线，是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过去我们不是说嘛，十七年路线一直是红线占主导地位。这问题恐怕还要分析，是不是？至于如果说三十年或者说二十八年，那是前两年讲的了，红线一直占主导地位，那末怎么解释我们发生了三年困难，怎么解释文化大革命中间国民经济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这就不能解释，你路线那么正确，你的成绩在哪儿哪？这样讲，这种意见大概全党的大多数、全国人民的大多数是不能够赞成的，这是一种意见。另外也有同这个相反的意见，当然我还没有听到说三十年一贯不正确，好象还没有。但是有这样的意见，认为1957年以后到1976年，二十年里路线都是不正确的，那就是大部分的时间路线是不正确的。有这样的看法：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那以后，“左”的思潮在党内有很大的发展。就思潮来讲是不错，是流行了二十年，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承认。但是如果说错误的路线，“左”的错误路线统治了党二十年，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个人在今年初理论务虚会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意见。五七年以后，是“左”倾的思潮，“左”的路线统治着我们的党，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这个还缺少一点分析，我们底下再来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两段时间，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大概在全党全国都没有什么分歧。一个是解放初期的七年，那就是1949年到1956年吧！这七年间工作做得很好，成绩很大，党的路线是

正确的。粉碎“四人帮”以来，1976年10月以后，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提出问题，说这个路线也不正确，我还没听见。那就是说有十年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一点大家是同意的。另外一方面，大概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恐怕路线是错了的。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等会儿我们再来分析，到底对不对。但是比较多的人同意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路线是不正确的，看起来大概是不正确的。那么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两方面都比较一致，或者趋于一致。比较大的问题是1957到1966这十年，就是十七年的后半段时间。这十七年的后半段时间呐，就应该分析一下了。这个十年可以说是我们党犯了“左”的错误，以至于犯了“左”的路线错误，然后又纠正，这么一个过程。是一个曲折过程。不是一直犯了路线错误，而是曾经犯了路线错误，后来又在纠正，这么一个过程。我认为这样理解国庆讲话，是比较同中央的意见符合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关于我们在57年和58年、59年，我们的党犯了什么错误？国庆讲话里是说了的。这里说：“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就是说，57年以后，我们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在胜利的面前不谨慎了，说得直率一点，就是有点骄傲了，我们不谨慎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同时取得了建设的很大的胜利，这是很了不起的，的确是很大的胜利。在国际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引起很大的乱子。我们发表了两篇文章《一论》、《再论》，赢

得了很大的声望，认为我们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出了好的主意，使得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那么大乱起来。所以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声望，也取得了胜利。在这个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开始不谨慎了，于是就犯了错误。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里说，1957年犯了一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原话是这样讲的：“1957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里讲两面，一面讲，反右斗争还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呢，它的错误就是扩大化了。是不是存在着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恐怕应该说是有的，是存在的。它是不是对我们的党进攻了呢？所谓进攻是个形象的说法了，他也没有进行什么武装斗争，是什么进攻呢？这是讲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进攻，就是说，他们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满意或反对我们党的领导，大概是这么个东西。什么共产党不行啦；什么应该轮流坐庄啦；什么应该设立一个政治设计院啦，让我们给你们设计政治方案啦；什么冤假错案很多啦，应该设立一个平反委员会，由各党派来共同组成啦……提出了诸如此类的意见。其中有若干的意见是攻击性的，我们对它进行反击。我们现在先不讲反击采取什么方式。批驳他，说他这是错的，告诉群众，按照这个意见做是不行的，这个看来是必要的。当然用什么方式来反击，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用开展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戴帽子的办法来进行反击，现在看，这个方式本身也是错的，不管怎么样，总之是扩大化了。把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扩大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五百万，右派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差不多知识分子里头每十个人就划了一个右派，打击面是很大的。到底

这些人是不是右派呢？搞了二十多年，最近才解决了。已经经过复查，证实是划错了的有93%，已经改正了。就是一百个划了右派分子的人，有九十三个是搞错了，这个错得很厉害，扩大化得很厉害。这是57年的错误，这个错误叫做“左”的错误，象后面讲的，这是“左”倾错误。这个错误是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还是路线的错误呢？一眼看去，好象是个路线错误，因为这是牵扯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恐怕还应该是个别的严重的“左”倾错误。因为这一年，1957年，在经济建设上，在整个政治生活、文化建设上，都是向上发展的。这个“左”的错误并没有影响到、危害到我们全国的工作。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这一年算起帐来，不是灾难的一年。1957年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很多人都讲，57年是个黄金时代啊，难忘的1957年呐，所以，不能说57年是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一个。

其次，关于1958年，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是这样说的：“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那么对1958年的提法，跟1957年就不一样了。这个错误没有那么正确的东西。因为违反了客观规律，这还不错吗？还犯了什么错误呢？就是‘瞎指挥’，主观主义的指挥，‘浮夸风’，这是包括高指标、高征购在内的。‘共产风’，就是对农民，采取了剥夺农民的办法，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把农民的东西一平二调，拿来共产了。把农民的东西拿来共产了，叫做共产风。这个错误是局部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呢？我看是全国性的，全国范围的，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全国上下没有例外。因

此，照我看，如果不承认1958年、还有底下讲的1959年、1960年犯了路线错误的话，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这是58年。

“讲话”中说：“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里也是说得很明确的，虽然只有一句话，一个说在党内开展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应该开展的，所以叫做不适当地开展了一场斗争，而这个斗争的内容又是错的，是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不存在的，是错误地上了纲了。它本来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正确的，你把它叫成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才叫做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替庐山会议，替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了。这句话等于是这么个意思，庐山会议那场斗争，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错了的。这个错误不单是党内斗争问题上错了，而且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1958年所犯的那些错误，“左”的错误，1958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发现了，因此正在着手纠正这些“左”的错误，开了两次郑州会议，从58年底到59年初。到了7月又召开庐山会议，前段也还是反对“左”倾的，纠正“左”倾的。这个“左”还没有纠过来，就半途而废了。因为这个时候不是都说在纠“左”吗？彭德怀同志也提了一个意见，认为应该更深刻地认识这个“左”倾的根源，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纠正这种“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成分非常广大，应该下劲儿把这个“左”的东西改正过来。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就从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右了，突然把矛头转过来反右。既然又右了，那么原来那个“左”还没有纠正就变得更“左”了。所以以后这个‘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就越刮越厉害，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有一年，或

者到下半年才来纠正，这就不得了。如果说，我们城市里头还不怎么觉得，也感觉到供应很紧张了，在农村里头那就引起了一场灾难，我们的农民受了很大的苦难。这个国庆讲话接着就讲：“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讲的就是这个，这个错误是属于“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从全党来说，犯这个严重错误的时间大概有两年到三年，58年、59年、60年的一部分时间。60年下半年就开始发现，而且已经在纠正了。这一段时间能不能说不是路线错误呢？我认为不能说，是犯了“左”倾的路线错误。我看我这样理解这个国庆讲话，比较接近原意。因为胡乔木同志9月25日在四中全会讲话里头也讲到这个问题了。他说十七年的后半段，57年到66年尽管有一两段时间犯了“左”的错误，他马上就接着补充一句，这样说可能不够，就是光说“左”的错误还不够，但是还是不能说1966年一直在执行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不能说1957到1966十年间都在执行“左”的错误路线，这就是等于说有二、三年时间是执行了“左”倾的错误路线。我是这样理解胡乔木同志那个讲话的，供大家参考。我认为只能说是犯了路线错误。因此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就是这样来的。

60年底、61年情况还是变化的。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要调整国民经济，提出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党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后，作出了决议。因为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南方，就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三个人到南方去，送文件给毛泽东同志看，毛泽东同志表示同意。因此就开始执行这八字方针，所以从61年起就不能说我们还是犯路线错误。